

從上海天主教會、文藝圈到域外遊記

——論晚清《三洲遊記》的「翻譯改寫」

顏 健 富*

摘 要

從原著到譯著的途徑中，常會因不同的脈絡語境而出現程度不一的翻譯改寫現象。本文以十九世紀後半葉的譯著《三洲遊記》為例，探討中國譯者在翻譯施登萊的「非洲」傳記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時，如何根基於特定的位置，如上海天主教會、滬地文藝圈與晚清域外遊記等脈絡，演繹各種與自身生存情境休戚與共的議題。譯者在原著的主軸上延展出一條條縱橫交錯的翻譯「歧路」，嵌入不同群體的問題意識與價值思考。本文先探討譯者如何呼應上海天主教會的宗教訴求，改寫原著的宗教教義，變為是宣揚天主教的譯本？接而，觀察譯者如何將自身的生命文本與詩學美感注入譯著，使得一部原本訴諸於非洲探勘記的著作，浮現滬地文人的情誼對話？最後，分析譯者如何將原著的地理學關懷轉嫁到晚清觀看世界的視角，介紹各國風土民俗與人文地理，呈現不同於原著的域外想像？凡此種種，皆能反映十九世紀後半葉的譯著如何受到譯者身分、報刊屬性與宗教訴求等而出現的翻譯改寫。

關鍵詞：非洲、遊記、晚清、鄒弢、龔柴、三洲遊記

2018年2月23日收稿，2019年6月6日修訂完成，2019年7月11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 言

1878 年，施登萊（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將自身探勘尼羅河源頭的數年歷程，寫成《穿梭黑暗大陸》（*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掀開外界乏人知曉的非洲內陸，備受各國矚目。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報刊，陸續刊登有關「施登萊」的新聞報導，從七十年代探入非洲尋找立溫斯敦、考掘尼羅河源頭、八十年代到探入蘇丹南部赤道拯救艾敏帕夏（Emin Pasha, 1840-1892）、九十年代獲英女皇頒發勳章等。1904 年 5 月 10 日，當施登萊於英國倫敦逝世，上海字林洋行出版的英文報刊《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報導其死訊時列舉上述各種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蹟。一個多月後又報導其葬禮概況。¹除「其人其事」的報導外，中國人士亦陸續觸及施登萊之著作。1882 年，來自粵省臺山縣農村的鄺富灼（1869-1931）以華工身分赴美，曾於居住教會公所學習英語：「西婦加凌 Carrington 敦氏，……，授余英文及初等科學，當日所（習）之《生理學》、《天路歷程》、《斐洲遊記》等書，俱深入余腦中，至今不能忘。」²1883 年，位於中國上海的《益聞錄》報館，更進一步翻譯連載施登萊之著作，自《益聞錄》第 279 號（1883）至第 736 號（1888），斷斷續續翻譯連載《三洲遊記》。1900 年，《匯報》館出版單行本時，改名《斐洲遊記》。

上述《三洲遊記》、《斐洲遊記》都是翻譯自施登萊的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由於本文將核對譯著內容與彼時發生的各種事件，採取更能彰顯原著作連載時間標誌的《益聞錄》版本。《三洲遊記》由虛白齋主擔任口述、鄒弢（1850-1931）筆述。口述者「虛白齋主」乃是號「虛白主人」的龔柴，法名 Simon Kiong，亦稱龔西門，號古愚，由於擔任天主教司鐸，又稱龔司鐸，曾主政《益聞錄》。龔柴的傳記資料不多，所幸 1915 年刊

1 相關報導可見“Sir Henry M. Stanle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04.5.12, p. 5; “Sir Henry’s Funeral,”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04.6.21, p. 5.

2 清·鄺富灼，〈六十年之回顧〉，《良友畫報》47(1930.5): 13。

登於教會刊物《聖教雜誌》的〈古愚龔公小傳〉留下珍貴記載：龔柴精數國語言，「無論辣丁、法文，振筆直書數十萬言，無勞思索。其藻思芊綿，洵所謂左右逢源矣。」³龔柴口述施登萊原著後，交由更擅長文學創作的同事鄒弢筆述。鄒弢，字翰飛，號瘦鶴詞人，無錫人，擅長短句、駢體文、散文、小說體等，才情洋溢。⁴1881年，他從蘇州來到上海，投入《益聞錄》報務。鄒弢雖以創作聞名，可是對於萬國事務亦有高度興趣，1885年完成《三借廬贅譚》一書已收入介紹世界各大洲的〈四洲〉。若再觀察他往後發表的《萬國近政考略》，乃是一部具高度專業性的歷史地理學著作。

關於《三洲遊記》譯本的發生背景、版本差異、翻譯策略與晚清中國人的評介等，筆者已另文處理。⁵本文在該基礎上，更進一步推進研究議題，探討譯本如何受到譯者身分、報刊立場與宗教機構的牽動，進而出現各種變調。學者多已指出「翻譯」在不同文化語境中，受到各因素的開拓／制約，為某種目的「對原文實施一定程度的操控（manipulate）」、⁶「對原文的一種改寫（rewriting）」，受到意識形態（ideology）、詩學形態（poetology）、贊助機構（patron）與論域（universe of discourse）等影響。⁷本文雖受翻譯理論之啟發，可是在論證過程中，未必凸顯理論視野，更偏重譯語／文化（target-language/culture）脈絡，聚焦觀察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中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如何根基於自身的語境脈絡而「改寫」原著？從「翻譯改寫」的角度切入，恰能觀察《三洲遊記》如何受到譯者

3 海門放眼達觀人，〈古愚龔公小傳〉，《聖教雜誌》4.2(1915.2): 66。

4 關於鄒弢的生平傳記與資料，可見錢琬薇，〈中國近代報人——鄒弢其人其書〉一文，有詳細的爬梳，收入錢琬薇，「失落與緬懷——鄒弢及其《海上塵天影》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30-73。

5 詳見顏健富，〈拆除主幹，拼湊片段——論《斐洲遊記》對於施登萊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的重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53(2018.9): 1-46。

6 Theo Hermans, 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1985), p. 11.

7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9.

的脈絡語境的牽引而出現特定的改寫路線。此一出自隸屬於上海天主教機關報底下的翻譯作品，受到晚清天主教義、新興報館機制、滬地文人交友圈與歷史地理學的啓發與牽制，回應彼時社會、宗教、政治、文藝等議題。譯者在原著的主軸上延展出一條條縱橫交錯的「歧路」，嵌入不同群體的問題意識與價值思考，演繹各種與自身生存情境休戚與共的議題，導入屬於自身脈絡的需求／訴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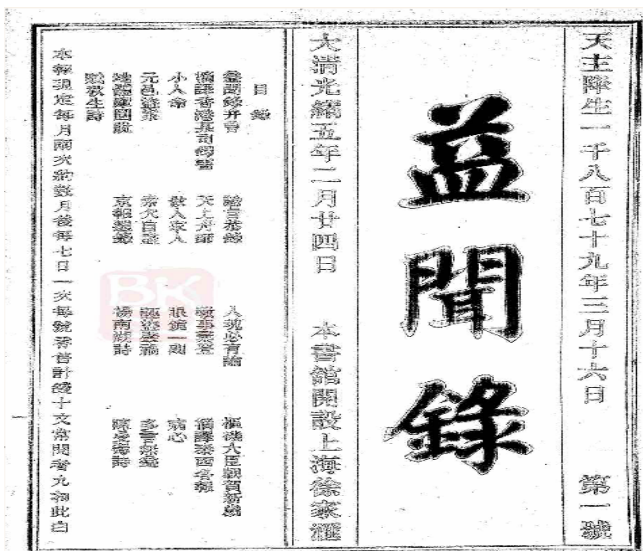
在論文結構上，本文先探索刊登於上海天主教會機關報的《益聞錄》的《三洲遊記》，如何在翻譯過程中嵌入上海天主教脈絡的路線，壓抑／篡奪施登萊原著的基督新教內涵，改而宣揚天主教理念？第二，譯者如何以滬地文藝圈為對象，注入上海文人的生平際遇與情感樣態，使得原本一部訴諸於非洲探險記的著作，卻浮現文人情誼的對話？最後，譯者如何在施登萊原著的地理學對話中，悄然改變對話群體，導入晚清人士觀看世界的視角，介紹各國風土民俗與人文地理等？

二、上海天主教會：教義改寫

七、八十年代的教會刊物雖普遍往綜合性刊物方向發展，可是大致保留禮拜儀式、教義問答與聖徒傳等宗教宣揚性文章。不同於彼時更常見的基督教會報刊如《萬國公報》、《中西聞見錄》等，隸屬巴黎耶穌會下的上海天主教會的《益聞錄》，乃是中國第一份天主教報刊，積極推廣天主教義理。本節將討論連載於教會報刊的《三洲遊記》如何因應天主教會的訴求，而依違離合於施登萊原著所出現的宗教脈絡，透過改寫的方式，投入屬於特定的教義內容與價值關懷？八十年代正處於中法衝突之際，群眾對於天主教義的批判，又如何牽動譯者對於《三洲遊記》的翻譯方式？

十九世紀中葉，隨著天主教禁令的鬆綁，由法國神父主持管理的上海天主教會，於徐家匯與土山灣一帶修建天主教堂，大小修院、徐匯公學、藏書樓、聖母院、博物院與天文臺等，形成方圓十幾里的天主教區。1864年，傳教士在土山遺址創設孤兒工藝院（前身為創辦於 1855 年的橫塘育

嬰堂)，收六至十歲孤兒，於院中開設工廠，設置木工部、五金部、中西鞋作、印刷所、圖畫間與照相間等部門。1869年土山灣印書館已有「七十種作品的木板」；1874年有活字鉛版印刷，發展正式的「印刷部」與「發行部」。⁸ 1878年12月16日，土山灣印書館推出中文報刊《益聞錄》試刊版，一直到1879年3月1日，總共刊出六期試刊本。1879年3月16日，《益聞錄》正式發刊，封面最右側標誌「天主紀年：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左邊則是列出「大清光緒五年二月廿四日」（見圖一），⁹ 可見到其綜合西方基督與中國紀年的傳播方式，內容有諭旨、地輿、天文算數、時事、新聞、傳記、文啓與詩詞等。



圖一 《益聞錄》創刊號封面頁

《益聞錄》除透過一般管道發售外，亦經由「各處天主堂分發」，¹⁰ 乃是以教義教規為主的天主教機關刊物。作為《益聞錄》主編的李杕

8 參考鄒振環，〈土山灣印書館與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2010.5): 1-14。

9 《益聞錄》1(1879.3): 封面頁。

10 清·編者，〈告示〉，《益聞錄》193(1882.4): 365b。

(1840-1911)，原名浩然，字問輿，後改問漁，受洗禮後取教名老楞佐，別署大木齋主，具有神學博士。¹¹ 在李杅的主導下，《益聞錄》刊登〈論人魂必有〉、〈人魂非氣論〉、〈魂體純神論〉、〈論魂在全身〉、〈人魂不滅〉、〈魂不銷亡〉與〈魂不輪回〉等具有思辨色彩的宗教義理文章，以條列、層遞與辯證的方式，替天主教義的終極關懷，開拓一哲學思考的向度。¹²

連載於《益聞錄》的《三洲遊記》，顯然受到刊物屬性的牽引，自行衍生宗教義理，回應《益聞錄》的宗教關懷。關於譯著加入的宗教內容，固然無法確切得知是出自於筆述者或口述者，卻可透過評估的方式，判斷龔柴的可能性更大於鄒弢。就《三洲遊記》於 1883-1888 年連載期間，龔柴早已完成神學訓練，如 1883 年吳詠秋〈題龔古愚司鐸《地輿圖考》調寄金縷曲〉已稱龔柴是「司鐸」，¹³ 而鄒弢要到 1899 年才「修身葆性靈（己亥受戒入教）」，¹⁴ 且僅止於「受戒入教」，無法跟龔柴「司鐸」身分與神學專業相提並論。龔柴又稱「龔司鐸」，¹⁵ 具有嚴謹的神學訓練背景，根據〈古愚龔公小傳〉一文，可見到龔柴在神學與哲學領域所取得的成就：

11 關於李杅的生平，可參見〈本館李問漁司鐸逝世〉，《聖心報》25.7(1911.7): 212-213；張若谷，〈古文家李問漁傳〉，《聖教雜誌》27.6(1938.6): 420-422。

12 《益聞錄》陸續刊登具有哲理思維的文章，認為「魂」有生、覺、靈、思等功能，如〈人魂必有論〉指出「魂」有生、覺、靈三種，使物能自動。人之魂即具有此三品而能在日常行動、生活外，學習思考與修養心性。見〈人魂必有論〉，《益聞錄》1(1879.3): 2b-3a。〈魂在全身論〉指出魂之於身，「全在一身之內，又全在各體之中」，因此既可全在首，亦可全在心、耳鼻口目、四體百肢，故稱一魂。魂之為體，則純一不雜。見〈魂在全身論〉，《益聞錄》16(1879.9): 92b-93a。〈論人魂永生〉從體用角度析論，認為造物有好生之德，且造物生魂，使其純然無形，因而不受外界所干擾，是以真性自存，靈明無損。即使經過時間的洗禮，也可永存。〈論人魂永生〉，《益聞錄》24(1879.11): 140a。

13 清·吳詠秋，〈題龔古愚司鐸《地輿圖考》調寄金縷曲〉，《益聞錄》286(1883.9): 401b。

14 清·鄒弢，〈王子秋感〉，《三借廬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3 詩，頁 109b。

15 各種稱龔柴為「龔司鐸」的文章如〈近事：本國之部：龔司鐸西滿〉，《聖教雜誌》3.4(1914.4): 176-177。條吟，〈賀龔古愚司鐸壽辰〉，《善導報》1914.12: 66。〈教務要聞追悼龔古愚司鐸〉，《善導報》1914.12: 46。

公於弱冠時，即淡名利，慕真修，進耶穌會，繕靈修德。維日孜孜，旋攻哲學及神律學，探奧抉微，多心得。七載畢業，晉學位，登鐸品，擁戴席。從遊中有自西土來者，於公哲學，初不免乎藐視，往往舉難題相質。公條記剖解，語語中肯，聽者皆動容，眾始心服，蓋華鐸之教授哲學者自公始。¹⁶

龔柴出生年不詳，可是根據上述引文，可見他二十歲進入耶穌會，以七年時間修讀神學與哲學，取得學位，晉級「司鐸」一職，且成為第一位教授哲學的華人司鐸。由於其華人身分，講授哲學與神學，不免受到西人質疑，卻每每能夠「條記剖解」、「語語中肯」，讓眾人心悅誠服。

從《益聞錄》刊物所具有的宗教機關屬性，到口述者龔柴的司鐸身分，都讓譯著在宗教教義上出現改寫的現象，使得原著出現各種基督新教內容轉為天主教義。就原著脈絡而言，施登萊原是無神論者，1871年見到立溫斯敦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 時深受對方鼓舞，受洗為基督徒。數年後，當他再度探入非洲內陸，試圖以基督教義馴化非洲「野蠻性」(barbarian)，¹⁷ 如 1875 年進入烏干達傳教，讓當地國王改教。譯者顯然沒錯過該情節，指出麥君抵達「伽罷加國」，在「哥里副相」的引介下探入該地區傳教，國王「恍然有悟，如開茅塞，即欲留麥君駐紮其地，將教中至理宣告國中」。¹⁸ 翻譯過程中，譯者因掌控不足而出現技術上的失誤，如「伽罷加國」(Kabaka) 並非一國之名，而是 Buganda 國 (烏干達前身) 的「君王」。「哥里副相」(Katekirofu) 並非「副相」，而是「總理大臣」。相比起翻譯技術之失誤，本文更關注譯者如何因自身的宗教理念而改寫原著內容？施登萊初次見到國王時便有意讓對方改信基督教 (make a convert of him)。¹⁹ 譯者卻循著自身的宗教需求，將人物變為「天主教」的代言者：

16 清·海門放眼達觀人，〈古愚龔公小傳〉，頁 66。

17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London: George Newnes, 1899), p. 63.

18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421(1884.12): 606a。

19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pp. 91-92, 202.

謂天地萬物，不能自生，必有一主宰掌之，如天地之開闢、日月之光明、萬物之生長、四時之運動，皆非自然所致。其所以能使之然者，則主宰為之也。當天地開闢之始，造有二人，男曰亞當，女曰厄娃，是謂萬民原祖，沿至於今，皆原祖所遺孳息。人生斯世，無非造物之恩。木本水源，當溯其始而欽崇之，此天主教敬奉天主之本意也。²⁰

譯者自行演繹一可以歌頌天主教義的情節，將「天地之開闢，日月之光明，萬物之生長，四時之運動」之「造物之恩」歸於「敬奉天主之本意也」，改變原著的宗教立場。《三洲遊記》逸出施登萊原著的宗教脈絡，恰能反映《益聞錄》此一機關報如何根基於自身的宗教立場，凸顯「天主」之「主宰之力」，甚至打破早期西方傳教士為消除中國民眾心理障礙而刻意依附於儒家道理的闡釋模式，²¹ 以天主教義理為絕對的依歸。

若將《三洲遊記》與彼時另一本非洲探險記譯本《黑蠻風土記》做一比較，更能反映譯本如何因刊物立場而受到改寫。1879 年，《申報》館翻譯出版立溫斯敦的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取名《黑蠻風土記》。由於譯者身分與出版機構——沈定年與《申報館》都非屬於宗教性質，因而大幅度刪除原著的宗教內容，導致立溫斯敦有意交代的「傳教」內容，一一遭到刪除。²² 相對之下，施登萊原著的傳教色彩遠不如立溫斯敦，可是卻因為刊物《益聞錄》與譯者龔柴的天主教立場而逕自插入天主教堂場景，如抵達西貢時「見天主堂一所，甚壯麗」、抵達新加坡時「有天主堂及耶穌堂各一座，居民約十萬人，商賈之盛，為東邦所罕有」、抵達散西巴爾時「有天主堂一所」。²³ 此一改寫，反映譯著如何

20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421(1884.12): 606a。

21 論者已指出《益聞錄》的天主教立場「反客為主，不再附和，而是反過來用儒家理論證明天主教理論的真諦。這是根本上的轉變。」孫瀟，「天主教在華第一份中文期刊《益聞錄》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 44。

22 相關研究，可見顏健富，〈晚清文化界對於 David Livingstone 與非洲探勘記的接受與傳播〉，指出譯者如何刪除宗教片段，收入李爽學、胡曉真編，《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2015），頁 448-449。

23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318(1883.12): 593a。

沿著贊助機構的需求而調動原著內容。²⁴ 譯者鉅細靡遺地描寫天主教最顯赫的聖殿——聖伯多祿大堂（今梵諦岡教堂），從建築外觀、內部陳設、花園草地、石柱人像、大自鳴鐘架、祭臺、教皇陵寢到宮中大廳，長達一千兩百多字，強調「水木之清華，宮室之喬麗，氣象之輝煌，規模之嚴肅，雖窮日言之，亦難盡述」。²⁵ 即使是描寫基督教堂，也是將之置入具有位階差序的比較架構中，如眾人遊逛罷迦毛（Bagamoya）遊逛基督教堂，「渴甚而不能得茶」時，見到「天主堂一所」，由「藹吉可親」的天主教士奉上咖啡。譯者自行增加「口渴→解渴」之情節，讓人物從基督教堂轉到天主教堂，得到舒緩。譯者描寫罷迦毛教區時，以徐家匯土山灣教區為楷模，寫出「學徒百餘人，分頭習業，有學印書者，有木作雕刻者，有學鐵工鞋匠者，別類分門，各勤乃事」、「公塾一所，生徒百餘人，除讀書外，並教以製造工藝、耕植等事」，²⁶ 實是效仿土山灣孤兒院設立印刷館與工藝廠學制，安排學生接受印書、雕刻、木工、鐵工、工藝、油漆與繪畫等實質商業用途之訓練。²⁷

除描寫天主教堂場景外，譯者更是一再嵌入天主教義，呼應《益聞錄》有意傳播的宗教義理。最明顯的案例，莫不過於巴仲和命喪非洲的葬禮安排。丁雪田在葬禮中對於中國民俗有諸多反思，實是《益聞錄》〈魂不用紙錢論〉、〈魂不附紙馬論〉、〈魂不用衣飾論〉與〈魂不飲食論〉等系列文章的迴響：批判中國迷信風俗，死後之魂不需人世間財帛。施登萊原著描寫眾人在一棵古老的洋槐樹下掘四英尺深的墳墓，埋葬客死異鄉的愛華德，在樹幹上刻十字架（見圖二），在落日餘暉中，將屍體置放在十字架

24 就翻譯理論而言，「贊助者」乃是指譯者背後的團體、宗教、政黨、社會階層、朝廷、出版商或各種媒介等，基於自身的立場、喜好與利益，透過特定機制如教育機制、學院、評審制度、評論性刊物等，發揮影響力，「足以促進或窒礙文學的閱讀、書寫或重寫的力量」。見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pp. 13-15.

25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431(1885.1): 47a。

26 同上註，《益聞錄》319(1883.12): 599a；《益聞錄》321(1884.1): 4b。

27 (法)史式徽 (Joseph de la Serviere) 編著，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江南傳教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卷2，頁293-294。

可投射的位置，讓軀體永遠安息。



圖二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中與死亡情節互相搭配的插圖

在教堂追思禮會上，從施登萊到非洲旺瓦納成員悲傷沉默。²⁸ 譯者沒忽略原著圖文並茂的悼念場景，描寫眾人將巴仲和安葬於「阿洲烏齊齊西山之麓」，「建十字架於墳前」，可是卻在追思禮中嵌入自身訴求，讓人物陷入民俗信仰與現代價值的拉扯：

余欲循俗禮，將所遺衣服燒燬，以供宴（冥）用，并欲自製紙帛焚之。麥君再三勸阻謂人死為鬼，其魂不在天堂即在地獄，衣服金銀將何從使用？況衣服紙帛既已成灰，安能復穿於身上？藏之囊中且有形之體，無形之魂，兩者相反。人生世間，永朝永夕，非衣食財帛，不克資生。死後則一切皆空，無求於世，豈有冥冥中必賴乎此哉？況冥帛不過一紙，安有人見為紙，而鬼反以為銀錢之理？²⁹

作為中國人物的丁雪田意識到若按照中國儀式，應將「所遺衣服燒燬，以供宴（冥）用，並欲自製紙帛焚之」，可是代表西方價值的麥君卻加以勸誡：「人死為鬼，其魂不在天堂即在地獄，衣服金銀將何從使用？」此凸

28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pp. 91-92.

29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544(1886.3): 118b- 119a。關於「宴用」應是錯別字，1900年《三洲遊記》結集為《斐洲遊記》時，改為「冥用」。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上海：上海中西書室，1900），卷4，頁22b。

顯情感 / 理智、傳統 / 西方的辯證，恰能反映《益聞錄》有關於「魂不附紙馬」、「魂不用衣飾」、「魂不飲食論」等既定立場。

若更進一步考量《三洲遊記》連載期間的時局變化，可發現譯者宣揚天主教的模式不只是違反施登萊原著內容，也與八十年代中法戰爭之際的民族話語多有糾葛之處。《益聞錄》自 1879 年正式創刊後不久，便逢中法爭議期間，劍拔弩張。光緒十年（1884）七月六日，清廷正式向法國開戰，兩軍相爭，局勢更是動盪。隸屬法國巴黎耶穌會底下的《益聞錄》一旦報導時事，立場尤顯尷尬。晚清報刊大多同仇敵愾、語氣激昂，《畫報》更以「中法之戰」作為發刊主旨，撻伐法國入侵。³⁰ 袁祖志出版於 1884 年的《談瀛錄》呼應民族時局，如〈泰西不逮中土說〉、〈中西俗尚相反說〉、〈火輪船不足恃說〉、〈天主教窮源論〉等高度立場化的文章，談論議題雖多，卻都指向「泰西不逮中土」，尤其嚴厲批判由法人管理主持的上海天主教會，「尊尚邪教，任其橫行，竭民脂膏，啓造禮拜堂，以有用之錢，置之無用之地」、「彼廢祭享，滅人倫。亂閨闈，污名節。即此二端傷我古風，敗我民俗，有甚於洪水之橫流，禽獸之食人者矣」。³¹

相形之下，《益聞錄》因親法屬性而較難加入批判行列，除連續性發出抗辯性文章如〈天主教被誣辨〉（《益聞錄》第 471、473、475、479 號）外，只能鼓吹更具普世價值的論調，如〈書中法新約後〉呼籲放棄戰爭，以議和為出路，「為兩國人民慶」。³² 可是，作為未來面的遠景展望與現實面的嚴峻際遇有相當落差，《益聞錄》之訴求不免一廂情願，屢受質疑，成為眾矢之的。連載於《益聞錄》的《三洲遊記》在動輒得咎的情況下，以折衷的筆調，強調中西融洽，緩和現實中的緊張局勢。行程一開始，譯者便讓麥君等人抵達新加坡時接受英國領事宴請，「供几席之珍饈」，「酒至半」，法領事等「次第起立，持杯祝主人」，麥君「詠西詩一首，眾人同

30 《畫報》創刊號指出：「近以法越構釁，中朝決意用兵，敵愾之忱，薄海同具。好事者繪為戰捷之圖，市井購觀，恣為談助。於以知風氣使然，不僅新聞，即畫報亦從此可類推矣。」清·尊聞閣主人，〈點石齋畫報緣啟〉，《點石齋畫報》甲集 1 期(1884.5): 2。

31 清·袁祖志，〈泰西不逮中土說〉、〈天主教窮源論〉，《涉洋管見》，收入《談瀛錄》（上海：同文書局，1884），卷 2，頁 2a、6b-7a。

32 清·佚名，〈書中法新約後〉，《益聞錄》361(1884.5): 242a。

聲對和」，丁雪田「進詠中國文詞」，³³賓主盡歡。譯者侃侃而談法人對西貢帶來的文明、規範、治理、器物與制度：「考西貢方域，本安南境地，咸豐九年，法人割據濱海數百里。明年，西二月十七日，樹法國旗幟，以守四隅，而西貢遂為法有矣。既據之後，竭力經營，成為通商鉅埠。」³⁴人物遊逛西貢途中，見到「街衢寬大，市井喧闐，貿易場中，生涯繁盛」。抵達製造局後，見到「煤火熊熊」的鐵爐、「有製造銅帽者，有鎔鑄火鎗者」；參觀「軍械房」時見「大小鋼礮數百尊，藥彈千餘箱」；瀏覽法人慕敦掌管之公塾時，見到講臺設計「中設一臺，教讀者居其上，兩旁度以長臺，眾學徒就臺列坐」。《三洲遊記》描寫中國人物隨麥君瀏覽製造局、公塾，觀覽機器、鋼鐵、砲彈與學校等，屢屢讚嘆，透過一系列「見到」的敘述，凸顯法人「超越尋常，以其能實事求是」、「誠罕見也」的貢獻。³⁵

由上可見《三洲遊記》因《益聞錄》屬性與譯者的宗教信仰，牽動其在中法戰爭此一敏感時刻中不同於一般中國人的視角，嵌入「天主教」的聲調。譯者衍生各種原著所無的天主教教堂與教會義理等片段，並且將原著的基督教信仰改為天主教義。不僅於此，處於中法戰爭天主教屢受批判的浪潮中，譯本透過「走向世界」的架構搭起中國人與西洋人的橋樑，淡化現實中的衝突，凸顯法人治理西貢的貢獻與天主教義理，反映譯著如何因天主教會屬性身分而出現的微妙變化。

三、滬地文藝圈：情誼展演

《三洲遊記》所展現的詩學、情感與美學，顯然可看到中國譯者的經營與投注。譯者透過一套早於原著問世前便存在於目的語的表現技法與文學傳統，將施登萊的非洲傳記，變為一部凸顯中國文人情誼的著作。本節將就各種資料的爬梳與對照，探討譯者如何在翻譯的過程中滲入自身與友人的生平際遇，使得一部有關非洲的探勘傳記浮現滬地文人的情誼對話？

33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294(1883.9): 449a。

34 同上註，《益聞錄》288(1883.9): 413a。

35 同上註，《益聞錄》289(1883.9): 418b。

核對譯者的生命故事，即可發現《三洲遊記》若隱若現地內嵌著筆述者鄒弢與滬地文人的互動身影。如果說譯本中的宗教義理主要來自口述者龔柴，那麼譯本中的情誼展演的部分，更可能出自於筆述者鄒弢。從譯著人物對於海外旅行的期許到生離死別的哀悼，處處可見鄒弢的影子。1850年，生於無錫的鄒弢「十八歲始來蘇從師」，³⁶ 從表叔錢乙生求學，期間認識俞達（?-1884），成為生平第一知交：「四海知音第一流，使君與我最相投。胥江五載同詩酒，山水清狂結伴遊」。³⁷ 1881年，鄒弢經歷「十戰棘圍未題」的考場失意後，自蘇州來到上海，「與申江黃式權秀才，同主益聞館筆政，昏燈晨硯，相得益彰」。³⁸ 1883年，鄒弢筆述《三洲遊記》期間，正逢文友袁祖志出訪海外，1884年，又逢摯友俞達「遽以風疾亡，為之歎息不已」。³⁹ 從袁祖志的海外出訪到俞達的驟然病逝，連鎖性牽動《三洲遊記》的翻譯轉向。鄒弢透過翻譯創作的方式，虛實交錯地回應文友的最新動態。若是對照鄒弢的現實際遇與譯本中虛構的成分，可更清楚見到譯者的情感迴圈如何層層展開？

就原著脈絡而言，1874年，施登萊前往非洲探勘尼羅河時，攜帶由英國《每日電郵報》推薦熟悉水域的英國博克兄弟（Francis Pocock and Edward Pocock）。英人倍感榮譽，船隻插上英國國旗，惕勉自己即或在最黑暗的時光也不要忘記自身的國籍。⁴⁰ 此一人物組合徹底受到改寫。譯者將美國新聞記者施登萊改為即將到非洲駐紮的領事——麥西登，去除Stanley之「ley」，冠上中國「麥」姓，變為「麥西登」，且又更進一步調動身分：「知中華文字」、「風雅宜人，情話纏綿」。原著的英國兄弟，在譯著中變為是「秋水芙蓉」、「相得益彰」的中國文人丁雪田與巴仲和。⁴¹ 隨著人物的調動，情節也跟著變化，施登萊途中原本停留英國迎接博克兄

36 清·鄒弢，〈讀書之難〉，《三借廬贅譚》，卷11，頁3a。

37 鄒弢，〈哭慕真山人俞吟香五十首之十一首（并引）〉，《三借廬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卷3詩，頁84b。

38 清·鄒弢，〈慘綠吟〉，《三借廬贅譚》，卷3，頁21b。

39 清·鄒弢，〈俞吟香〉，《三借廬贅譚》，卷4，頁3b-4a。

40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p. 49.

41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三洲遊記〉，《益聞錄》279(1883.8): 359a。

弟，譯本卻變為是麥君停留中國迎接丁雪田與巴仲和。凡此種種，都可見到譯者將人物、地點「中國化」的傾向。譯者接而變換敘事視角，將施登萊視角改為丁雪田，更進一步掙脫原著束縛，透過虛構人物的視角，大幅度滲入鄒弢與滬地文友的情誼對話。

鄒弢雖遲至 1881 年才到上海，可是早於七十年代處於蘇州期間便以「瀟湘館侍者」、「梁溪瘦鶴詞人」等筆名，投稿《申報》副刊《瀛環瑣記》、《四溟瑣記》、《寰宇瑣記》，與多位滬地文友唱和。⁴² 鄒弢自蘇州來到上海，參與《益聞錄》報務工作，更進一步拉近他與滬地文友的關係。《益聞錄》如同彼時的《申報》與《滬報》等，闢有詩文天地，創刊號〈弁言〉呼籲文人投稿：「乞風雅文人，高明學士，或攜錦繡詩章，或示圭璋典則，能使沁人肺腑，砭世膏肓者，概期賜惠登錄，庶得增輝卷冊。」⁴³ 鄒弢除透過詩文與文友唱和外，⁴⁴ 日常生活亦有往來。1881 年春，袁祖志（1827-1898）於四馬路（今福州路）胡家宅附近租賃房子，以「楊柳樓臺」命名，成為文人「詩酒流連」的聚集之地，「一時詞壇健將如龍湫舊隱、藜床舊主、瘦鶴詞人、縷馨仙史輩，詩酒流連，迄無虛日」。⁴⁵ 號「瘦鶴詞人」的鄒弢屬其中一員，撰文紀錄楊柳樓臺的布置與文人聚集的盛況：「辛巳春，錢塘袁翔甫大令祖志，於滬上北郊關三弓地，高樓大道，踈地垂楊。對宇為西人花園，屋之後悉曲院。月夕花晨，笙歌四起，致足樂也。」⁴⁶ 袁祖志，字翔甫，號枚孫，別署倉山舊主、楊柳樓

42 鄒弢自 1870 年代在《申報》有許多與文友唱和之詩文，如〈宮閨聯名譜題詞即塵縷馨仙史正可〉，《申報》第 1410 號（1876.11.27），頁 3。〈賀新涼·再贈賦秋生并柬存恕齋主人正和〉，《申報》第 1808 號（1878.3.20），頁 3。〈滿江紅·再題陳卓軒珍硯齋圖代徐佩之丈作〉，《申報》第 1869 號（1878.5.30），頁 3；〈懷龍湫舊隱兼寄縷馨仙史味梅館主賦秋生倉山舊主飯顛山樵〉，《申報》第 2340 號（1879.11.4），頁 4。〈李小寶詞史詩詢近況原韻奉答〉，《申報》第 2374 號（1879.12.8），頁 3。

43 清·佚名，〈益聞錄弁言〉，《益聞錄》1(1879.3): 1。

44 如〈心禪居士自虞陽貽書來尚湖漁隱附詩寄懷即次原韻呈政〉，《益聞錄》162(1882.6): 172b。〈和花影詞人贈湘蘭韻錄塵晒正并乞縷仙朵紅賜刊〉，《益聞錄》441(1885.3): 107a；各文友也寫給鄒弢，如俞鍾詔，〈寄懷瘦鶴詞人〉，《益聞錄》162(1882.6): 172b。慕真山人，〈和瘦鶴詞人留別原韻〉，《益聞錄》123(1881.10): 252a 等。

45 陳伯熙，《上海軼事大觀》（上海：上海書店，2000），頁 123。

46 清·鄒弢，〈楊柳樓臺〉，《三借廬贅譚》，卷 7，頁 1a。

臺主，浙江杭州人。鄒弢雖與袁祖志相隔二十三歲，可是卻因共具文人與報人身分，精通舊學又重視西學，對於萬國事務饒感興趣，又有舊文人冶遊習性，超越年齡鴻溝，展現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滬地文人的情誼對話。袁祖志出版《海上吟》時，鄒弢為之作序，稱「翔甫大令倉山」乃是「詩裔福地宰官」，「餐林花而口齒含芳，割尺錦而雲霞奪江山」。⁴⁷ 袁祖志出訪海外時於《申報》發表〈海外懷人詩〉獻詩給鄒弢：「遲我卅年游海上，翰君拔幟遽登壇。裁紅暈碧天然處，好句教人擊節看。」⁴⁸

1883年，袁祖志獲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之邀，自光緒九年三月十二日（1883年4月18日）搭上輪船出訪時，一直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84年1月19日）歸抵上海，「計時則十閱月，計程則九萬八千餘里」。⁴⁹ 袁祖志的遠行牽動鄒弢當年八月於《益聞錄》筆述的《三洲遊記》方向。雖然，袁祖志紀錄海外行程與異域風光的《談瀛錄》要到1884年冬天才出版，可是其出訪訊息與海外觀察，早於出訪海外期間便透過現代化的電郵方式，跨海傳送到上海，刊載於《申報》。文人親身體驗世界之旅乃是張力十足的題材，更何況經由銷售量最大的《申報》發表刊登。就在招商局啓程三個月後的八月五日（1883年9月5日），《申報》以大篇幅版面刊登袁祖志自海外傳來的異國記載，如〈舟入錫蘭島〉觀察錫蘭「一入錫蘭境，民猶太古風，殊形疑佛子，異寶出蛟宮」、⁵⁰ 〈舟行南洋中三十餘日苦熱日甚感而有作〉描述「洪波如鼎終朝沸，赤日行空似火添」⁵¹、〈亞丁島〉記錄「地靈悶不開，天心漠弗眷，不雨恒三年」。⁵²

當鄒弢眼見身邊熟識的文友袁祖志出訪時，心緒不免有所牽動。從《益聞錄》第278號刊登〈小引〉後，279號起（1883）至736號（1888年）連載《三洲遊記》，可見到鄒弢透過翻譯改寫施登萊著作的方式，投射個人的缺憾與夢想。一生未曾出遊的鄒弢，在譯本中虛構一可對應自我的人

47 清·鄒弢，〈序〉，收入袁祖志，〈海上吟〉，《談瀛錄》，卷6，頁1a。

48 清·袁祖志，〈鄒翰飛茂才弢〉，《海外吟卷下》，《談瀛錄》，卷5，頁2a。

49 清·唐廷樞，〈序〉，清·袁祖志，《談瀛錄》，頁1b。

50 清·倉山舊主，〈舟入錫蘭島〉，《申報》第3704號（1883.8.5），頁3。

51 清·倉山舊主，〈舟行南洋中三十餘日苦熱日甚感而有作〉，《申報》第3704號（1883.8.5），頁3。

52 清·倉山舊主，〈亞丁島〉，《申報》第3704號（1883.8.5），頁3。

物——「每欲遠遊，恨無共事」的丁雪田，同時又透過創作所具有的「反轉」功能，安排西人麥君邀約出訪，一償夙願。現實中的鄒弢雖然獲得薛福臣的多方鼓舞，如肯定他對於洋務「頗有門徑」，「勸令出洋」，可是終究「以親老不能遠遊為慮」，致使薛感慨萬千，指出鄒「處境多困，遭際艱難」⁵³ 從此切入，愈可凸顯譯著〈小引〉指中國人士「欲遊而不能遊」的缺憾，乃是鄒弢心聲的投射：「其有家貧親老，風燭驚心，瑣屑米鹽，上則牽於父母，下則累於妻孥」。⁵⁴

藉由譯本內容與生命傳記的對照，即可見到鄒弢將自身的身世背景投射到譯著人物身上，彌補自身無法出訪的缺憾。幾乎就在《申報》刊登袁祖志的海外記載的同一時段，鄒弢也在《益聞錄》編織一可跟袁祖志海外之旅媲美的《三洲遊記》，不無競逐與致敬之意。無論是從人物組合、路線安排到行旅感慨，都可見到鄒弢以袁祖志作為回應的潛在對象。施登萊原著描寫自身出發出席由《每日電訊報》與《紐約先驅報》所辦的兩場小型餞別會，⁵⁵ 鄒弢卻因面臨彼時袁祖志受到滬地文人賦詩送別的盛況，⁵⁶ 必然誇張描寫，擴大餞別次數，如「曼卿、升之約於十二日，在王家花園餞行」、「玉堂約於十三日，在伊家中餞行」，甚至疲於奔命，「有辭去者，有未能辭去者」。⁵⁷ 若就人物組合而言，《三洲遊記》以擅長文筆或語言的丁雪田與巴仲和，遠不同於施登萊原著中擅長水性的博克兄弟，實反映譯者如何根基於自身的脈絡而調動原著內容。丁、巴等人物組合與其說是回應原著中的博克兄弟，倒不如說是回應上海輪船招商局出訪時邀

53 清·薛福成，〈薛敘〉，《泰西各國新政考》，頁 1a。

54 清·佚名，〈三洲遊記小引〉，《益聞錄》278(1883.8): 353a。

55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p. 6.

56 如清·齊學裘，〈癸未三月中澣倉山舊主翔甫仁兄世大人應聘出洋壯游各國詩以送之卽用其祝壽原韻〉，《申報》第 3597 號（1883.4.20），頁 3。泳甫世瀛，〈倉山舊主應唐景星觀察之聘將有泰西之行賦此贈別卽請諸大吟壇正和〉，《申報》第 3598 號（1883.4.21），頁 4。臥霞逸士，〈倉山舊主翔翁明府鄉大人，素擅詩才，久為滬邦所共仰，今應唐景星觀察之聘，歷游海邦，見有友人送行詩三章因步其韻錄請諸大吟壇正之〉，《申報》第 3603 號（1883.4.26），頁 4。

57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280(1883.8): 364b。

請的白竦與袁祖志此一組合。根據唐廷樞總辦之記載，美人白竦「通數國語言文字」，擔任翻譯工作。袁祖志則是「條分縷晰」，負責記載各地「六事」——政令，民俗、疆土、武備、物產與制作。⁵⁸ 鄒弢譯著中的丁、巴組合亦可見到如此色彩：巴仲和「深通西語」、「均以法語通詞」、「言語旁通，中西涉獵」，丁雪田則因「風流文采」而擔任「文案」。

就行程感慨而言，以文筆見長的袁祖志寄給《申報》的海外紀錄，或是吟詠雄情壯志或是抒發思鄉情懷，充分揮灑文學才情，如 1883 年 8 月 5 日〈癸未李春唐景星觀察招游歐洲倚裝漫成即呈諸大吟壇正之〉寫「掉頭不顧九萬里，男兒壯志當若此。矧我蒼茫獨立身，牽裾挽袂無妻子。斯時不游更何期，招邀情重尤難已。一諾甘輕海外行，幾人默喻此中旨。」⁵⁹ 連載於《益聞錄》的《三洲遊記》，透過丁雪田視角吟詠多首「男兒志在四方」之詩詞：「男兒墮地非凡庸，不甘雌伏窮蒿蓬，絕裾掉首出門去，飄然天地飛冥鴻。冥鴻展翅入雲際，俯視下方眼界空，曠覽八方小於笠，中邦一點蒼烟中。」⁶⁰ 譯者透過文人創作所習見的高度修辭與意象，詮釋人物在茫茫天地之間的感受，拓深情感意識，與其說是翻譯施登萊原著，倒不如說是回應袁祖志詩詞的內容。袁祖志的出訪，一路牽動著《三洲遊記》的翻譯轉向。若就路線安排而言，可更清楚看到譯者因回應袁祖志橫跨歐亞的行程而偏離施登萊原著的路線。施登萊原著〈前言〉交代行程背景後，第一章則以 1884 年 9 月 21 日進入散西巴爾為始。譯著卻安排人物橫跨中國、西貢、新加坡、錫蘭與亞丁等地，且加入歐亞路程說明：

若自上海開至法國馬賽利埠，凡九站，上海至香港二千九百六十三里，今自香港開行，祇八站程耳。行船之例，每至一處，先時懸出一粉漆

58 根據唐廷樞替 1884 年出版的袁祖志《談瀛錄》作〈序〉時指出，邀請袁祖志之因：「力有未逮，爰與本局管事美人白君竦及錢塘袁翔甫先生偕行。白君能通數國語言文字，鈎翰結格，入耳了然，重譯而屬諸袁君。袁君議區六事，首政令，次民俗，次疆土，次武備，次物產，次制作，條分縷晰，眉目井井。」清·唐廷樞，〈序〉，《談瀛錄》，頁 1a。

59 袁祖志，〈癸未李春唐景星觀察招游歐洲倚裝漫成即呈諸大吟壇正之〉，《申報》第 3704 號（1883.8.5），頁 11。

60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352(1884.4): 191a。

牌，如上海至香港一站若干路，則牌上標出若干路程。既抵香港，則將前牌撤去，又易一牌，則云香港至西貢一站若干里，餘皆類此。⁶¹

此一從上海到法國馬賽驛埠的路線說明，無論就敘述語氣或路線安排，都可跟袁祖志的「出洋路線」相映成趣。袁祖志《出洋須知》提及從上海、香港（「中土內洋」）到馬賽的橫跨歐亞之路線，沿途停留西貢、新加坡、錫蘭、亞丁、蘇彝士河、鉢碎、拿波里，與法國馬賽碼頭，並且詳細說明各碼頭距離。⁶² 循此，《三洲遊記》翻譯原著的路線時，經由跳接的方式置入晚清人士連貫歐亞的路線，大大偏離原著的路線。此一參照回應袁祖志的歐亞路線，不只是偏離施登萊路線，而且違反《三洲遊記》此一譯本接下來翻譯連載的內容——人物由上海到西貢、新加坡、錫蘭後進入非洲，實未進入歐洲。

《三洲遊記》不只潛藏著鄒弢與袁祖志的對話，尚植入他哀悼生平第一知己俞達（?-1884）的深沈情感。就在《三洲遊記》連載的 1884 年夏天，鄒弢接獲俞達患病身亡的噩耗，撰寫〈俞吟香〉回顧兩人交情：「人謂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余幼作客，歷館胥門，幾及十年，所交亦眾，惟趨炎逐熱，俱非同心，獨吟香一人，可共患難」。⁶³ 俞達，字吟香，號慕真山人，江蘇常州人，著有《青樓夢》、《醉紅軒筆話》、《吳門百豔圖》與《吳中考古錄》等。鄒弢於〈哭慕真山人俞吟香五十首之十一首（并引）〉提及他與俞達的交情：「君名達，居洞庭西山，余平生第一知己也。中年淪落蘇臺，窮愁多故，以疏財好友，家日窘而境日艱」，流露自身對於摯友死亡的深沈悼念。他透過〈哭慕真山人俞吟香五十首〉組詩抒發自身連綿不絕的哀悼之情，「肺腑論交正十年，平生遭際共相憐。疏狂落拓兼風雅，一樣心情綺恨牽」。⁶⁴ 此一情感亦延伸到《三洲遊記》，1886 年 3 月，當鄒弢翻譯施登萊原著第五章英國博克兄弟的生離死別場合時，滲入現實

61 同上註，《益聞錄》284(1883.8): 388b；286(1883.9): 401a。

62 清·袁祖志，〈一程站須知〉，《出洋須知》，《談瀛錄》，卷 4，頁 2a-2b。

63 清·鄒弢，〈俞吟香〉，《三借廬贅譚》，卷 4，頁 3b。

64 清·鄒弢，〈哭慕真山人俞吟香五十首之十一首（并引）〉，《三借廬集》，卷 3 詩，頁 84b。

中的自身際遇。博克兄弟隨施登萊探入非洲途中，弟弟愛華德途中陷入熱病，眾人雖照護有加，卻回天乏術。眼看弟弟嚥下最後一口氣，作為兄長的法蘭克意識到弟弟「魂魄永遠離開」，痛苦發抖，發出尖叫聲。死亡場景配合上醒目的圖片（見圖三），⁶⁵ 不只是讓譯者關注到該段落，更觸動情懷，演繹人物在非洲生離死別的情節。



圖三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中與死亡情節互相搭配的插圖

《益聞錄》第 541 號連載《三洲遊記》之片段，可見譯者安排巴仲和如同原著的愛華德陷入疾病，「唇上焦黑，知不能起」、「始而嘔瀉，繼則滿身赤熱」，丁雪田如兄長法蘭克般「日夕調護藥水手量」的照顧。⁶⁶《益聞錄》554 號之連載內容，交代巴仲和回天乏術，「氣急聲漸，兩目直瞪，須臾宛轉而死」，丁雪田「不能復語，痛倒大呼」，⁶⁷ 接而又擬七百餘字碑文紀念巴仲和：「幼歲多才即識風丁之字，髫齡失怙，難酬高大之恩」，且將死者置入中國悲苦文人的系譜，際遇甚於阮藉、蘇秦、劉蕢、趙壹等人……「中年憂戚，他國流離，拋家室於遙天，掠烟霞於大地，身飄

65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pp. 91-92.

66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541(1886.3): 101a。

67 同上註，《益聞錄》544(1886.3): 118b。

似葉，江湖之迹空留，命賤於毛，藥石之靈莫乞」。⁶⁸《益聞錄》第 553 號之連載內容，丁雪田感嘆友人「飢寒迫我，鹽米勞人，唐衢悲行路之難」之際遇，葬於他鄉，「故園何處，難歸瑤海之魂，短夢無常，漫下瓊田之淚」。⁶⁹一直發展到《益聞錄》676 號，丁雪田的悼念之情絲毫未減損，「余自仲和故後，終日傷心，不能道一字」，遇重陽節「攜酒登高」，「深憶仲和淒然淚下」，連續以六首詩詞唱出內心淒絕，登高返回後又「夜憶仲和不能成寐」，「聽丁丁玉漏聲」，讓人「愁心擣碎」，傳達「百轉迴腸沒箇人知道」之心境。⁷⁰

從情節經營到文句氣氛之烘托，鄒弢將生離死別之情感發揮得淋漓盡致。對於擅長描寫哀悼之文的中國文人而言，如此情深意切的描寫，不讓人意外。只是，《益聞錄》連續多期連載《三洲遊記》之內容，都圍繞著丁雪田哀悼巴仲和的場面，反覆出現原著所無的悼詞，非比尋常，遠超過作為「生離死別」的橋段安排，寄寓譯者現實中無法自拔的哀悼情懷，形成多層次的對照。現實生活中的鄒弢在〈哭慕真山人俞吟香五十首之十一首（并引）〉指出：「聊成數絕，拉雜書來，不知是墨是淚也？」⁷¹《三洲遊記》中的丁雪田悼念巴仲和也指出：「拉雜書來，還不知是墨是淚？」⁷²透過「拉雜書來」、「不知是墨是淚」等修辭，譯本交織著鄒弢現實中刻骨銘心的情誼，真實人生與譯著書寫相互交錯，真耶？幻耶？丁雪田對於巴仲和的連串悼詞，可視為〈哭慕真山人俞吟香〉的變形與迴響。現實中的鄒弢回顧自己與俞達「肺腑論交正十年，平生遭際共相憐」，⁷³譯本中的丁雪田則是指出自己與巴仲和「廿年白社訂知音，患難相憐結契深」。⁷⁴鄒

68 同上註，頁 119a。

69 同上註，《益聞錄》553(1886.4): 173a。

70 同上註，《益聞錄》640(1887.3): 88b。

71 清·鄒弢，〈哭慕真山人俞吟香五十首之十一首（并引）〉，《三借廬集》，卷 3 詩，頁 84b。

72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640(1887.3): 88b。

73 清·鄒弢，〈哭慕真山人俞吟香五十首之十一首（并引）〉，《三借廬集》，卷 3 詩，頁 84b。

74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635(1887.2): 58b。

弢唏噓「胥江一別，誰知後會無緣，迴憶交情，腸寸寸斷矣」，⁷⁵ 丁雪田則是喟嘆「以平生知己，而中道分殂，真人間第一恨事也」。⁷⁶ 鄒弢的現實經歷與譯本的人物際遇所交集出來的虛實文本，共同折射相知相惜的情誼與生離死別的憾恨，恰如其分地詮釋鄒弢失去生平第一知己的心境。

在翻譯改寫中，譯著嵌入上海文藝圈的脈絡，反映文人如何透過報刊展演自身的情誼。譯者透過文字、意象、典故與文學傳統，將施登萊原著置入中國文人的詩學創作中，寄寓一己的深沈情感，從回應文壇前輩袁祖志的海外之旅到悼念摯友俞達，浮現譯者與滬地文人之間的對話，牽動譯本的轉向。

四、晚清地理學：域外想像

《益聞錄》雖屬天主教機關報，卻高度關注地理學，積極刊登各種介紹世界歷史地理學的報刊與書籍，從各國地理、經緯度、政治體制到各國的風土民情與新聞動態等，反映近現代「天下」到「世界」觀的轉變。1879年，正式創刊的《益聞錄》在傳播宣揚宗教教義的基調上，開闢「五洲雜俎」、「時事匯登」、「海外通訊」等專欄，提供歐、美、亞、地之歷史、地理、科學、人文等時事訊息，反映開闊的視野。⁷⁷ 從表層而言，該報館翻譯連載施登萊的「非洲探險記」，原可以順理成章地接受原著的地理學視野，可是，實際的翻譯，卻有著更複雜的途徑，譯者受到自身語境的影響，接駁／錯置／衍生屬於晚清人士脈絡的域外想像，開啓不同於原著的「世界」櫥窗。

75 清·鄒弢，〈哭慕真山人俞吟香五十首之十一首（并引）〉，《三借廬集》，卷3詩，頁84b。

76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635(1887.2): 59a。

77 《益聞錄》刊登各種有關科學知識內容的文章，如地理學、物理學、工程記述、天文學等，其中地理學占超過一半。

從譯者身分觀之，無論是口述者龔柴或是筆述者鄒弢，對於地理學都有專業的掌控。龔柴自《益聞錄》創刊開始，便成為刊物班底人物，固定發表地理學文章，⁷⁸ 發表〈地球形勢說〉、〈緬甸考略〉、〈阿富汗考略〉與〈東土耳其考略〉等。1883 年，龔柴編輯出版《地輿圖考》，收錄地理學總論、中國與亞洲卷，隨後又於此基礎擴增美洲、非洲與歐洲卷，編成《五洲圖考》，獲評為「旁搜博採，考核精詳，非學貫夫中西者，安得有此富贍？」⁷⁹ 筆述者鄒弢比龔柴稍晚加入《益聞錄》，1881 年自蘇州來到上海，投入《益聞報》編務，⁸⁰ 著《萬國近政考略》，收錄〈天文考〉、〈地輿考〉、〈沿革考〉、〈風俗考〉、〈軍政考〉、〈教派考〉與〈列國編年紀要〉等內容。1890 年，鄒弢的無錫同鄉——洋務大臣薛福成（1838-1894），出使英、法、義、比國時途經上海時，鄒弢「持全書來相質證」。薛見書中「考據確切，讀而嘉之」，對照彼時談時務者「非失之迂，即失之固」的歪風，愈加肯定鄒弢「徵之近聞」的作風，因而能夠「與耳食無憑者，相去霄壤」，且呼籲該書儘速出版，「囑將書速付手民，以裨當世」。⁸¹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鄒弢創作出版的《海上塵天影》，將各種地理學知識轉化為小說敘事的空間背景，安排人物遊走美國、香港、日本、義大利、俄國等地，反映其對於世界地理學知識的掌控與轉化能力。

從口述者到筆述者，對於歷史地理學，都有積極的關注與專業的掌控。當譯者面向同樣訴諸於地理學的原著時，顯然受到自身地理學語境的牽引，改弦易調，逸出原著脈絡。施登萊原著《穿越黑暗大陸》有特定的

78 1883 年，龔柴替《地輿圖考》作序時指出自己過去四年在《益聞報》館的工作概況：「輯著《地輿圖考》，刊列報內，迄今四歷寒暑，悉心探究，涉獵中外諸書。其山川形勝，風土人情，諸國疆域之寬窄、開國之遠近、世代之沿革、物產之盛衰、人才之優劣，凡實有益於見聞而堪資印證者，畧具於篇句，不尚艱深，詞不求華藻，匪特腹餒所致，亦理所宜然也。」清·龔柴，〈敘〉，《地輿圖考》（上海：益聞館，1883），頁 5a。

79 清·海門放眼達觀人，〈古愚龔公小傳〉，頁 66。

80 清·梁溪瀟湘館侍者輯，《春江花史》，卷 1〈陳玉卿〉中載：「辛巳秋余始來滬上，主益報館筆政。」見《春江花史》（上海：二石軒印行，1884），頁 1-2。

81 清·薛福成，〈薛敘〉，收入《泰西各國新政考》，頁 1。此乃是根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光緒二十一年（1895）版本，出版地不詳，封面題為《泰西各國新政考》，內頁題為《萬國近政考略》。

地理學主旨：揭開眾說紛紜的「尼羅河源頭」謎團。史畢克（John Hanning Speke, 1827-1864）、博頓（Richard Francis Burton, 1821-1890）與立溫斯敦先後探入非洲內陸，探索尼羅河源頭，卻始終無法達成共識。立溫斯敦臨死前仍留在非洲，誤將剛果河視為尼羅河源頭，留下未竟之志。施登萊受到立溫斯敦的感召，矢志完成其心願：

The work he had promised me to perform was only begun when death overtook him! The effect which this news had upon me, after the first shock had passed away, was to fire me with a resolution to complete his work, to be, if God willed it, the next martyr to geographical science, or, if my life was to be spared, to clear up not only the secrets of the Great River throughout its course, but also all that remained still problematic and incomplete of the discoveries of Burton and Speke, and Speke and Grant.⁸²

上述引文清楚可見施登萊如何在繼承立溫斯敦的任務上，揭開各地理學前驅如博頓、史畢克與格蘭特等人尙未能完整交代的尼羅河源頭問題。1874年9月21日，他抵達散西巴爾（Zanzibar），經過長途跋涉，1875年2月27日，終於抵達史畢克發現的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環繞湖畔周邊各地，抵達其北部的黎彭瀑布（Ripon Falls）與卡蓋拉河（Kagera River），確認其通向尼羅河，證實史畢克有關維多利亞湖是尼羅河源頭的觀點。施登萊原著頻頻探討前輩之觀點，開啓探向尼羅河源頭的地學理視角。

無論就譯本的刊登場地、口述者與筆述者，對於地理學都有高度的關注，可是卻有不同於施登萊原著的位置。譯本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抽換施登萊的地理學的對話群體，開啓屬於晚清脈絡的「世界」櫥窗，嵌入各種歷史地理學與域外遊記的內容。早在《三洲遊記》正式連載的前一期所刊登、具有序言作用的〈小引〉便預告了譯本的轉向。〈小引〉抽離施登萊探勘尼羅河的線索，以自身的位置為起點，強調「今值聖人之朝四海諸彝舟車悉達，合地球之大，無不可以涉足」，因而得「乘風破浪，一賞海外之奇，以拓其襟臆，舒展其耳目」。「今值」之修辭表現「當下」之感，

82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p. 1.

回應十九世紀以降新地理學在中國的傳播趨勢，傳達「志在山水，不願蝸居」之訓誨，表現「欲極五洲萬里之遙，一觀其山川人物」的決心。⁸³譯者循著自身的地理學論域，在隨後的翻譯連載時，嵌入各種彼時慣見的各大洲介紹：

地球之體，周圍八萬七千一百九十二里，直徑二萬七千六百九十二里。東半球由東北至西南，直路三萬五千餘里，分三大洲。一名亞細亞，其中最大之國為中華，次則俄羅斯，又次則印度天竺，今為英吉利屬部。又有東土耳其基，其餘小國，未能備列。一名歐羅巴洲，其中列國，有英吉利、葡萄牙、法蘭西、瑞典、西土耳其基、西班牙、荷蘭、德意志等國；一名阿非利加洲，有英吉利屬國，另有衆小國，類多黑人所居；在東半球之南，有澳大利國，地土甚廣，長八千四百里，闊六千三百里，近中帶之間，海洲羅列，各自成國；西半球一帶，自為一洲，一名北亞美利加，一名南亞美利加，二地相連，自北至南，二萬九千餘里……在東、西兩球之間，有太平洋、大西洋，大西洋東西一萬零五百里，南北三萬五千里，乃東海之最大者。⁸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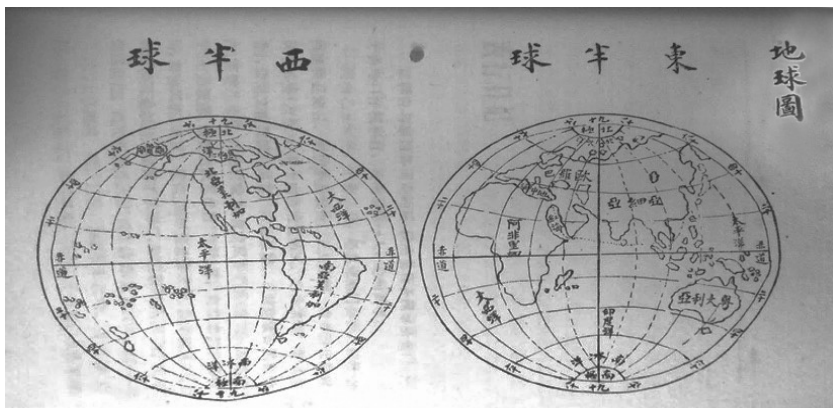
譯者以俯瞰性的視野，觀及五大洲地理位置、經緯度與海洋分布等，彰顯一籠統的地理學知識。若更仔細核對全文，可發現上述刊登於 1886 年 11 月《益聞錄》引文乃是筆述者鄒弢援引自身 1885 年出版的《三借廬贅譚·四洲》一文，⁸⁵先從東半球東北到西南位置介紹亞、歐、非與澳洲，又從西半球介紹北美與南美洲，再提及東西兩球之間的太平洋與大西洋。鄒弢的介紹模式又可見晚清常出現的地理學論域，如張德彝（1847-1918）〈地球圖〉（見圖四）早已透過東半球與西半球圖介紹五大洲以各海洋之分布：「所有陸地分為五大洲，在東半球者有亞細亞，有歐羅巴暨阿非里加；在西半球者，一曰南亞美利加，一曰北亞美利加，二洲之間中有脛地毗連。又有水程共分五洋，曰大東洋又名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冰洋、北冰洋。」⁸⁶

83 清·佚名，〈三洲遊記小引〉，《益聞錄》278(1883.8): 352b-353a。

84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533(1886.11): 54a。

85 清·鄒弢，〈四洲〉，《三借廬贅譚》，卷 11，頁 24b-25b。

86 張德彝，《航海述奇》，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 7 冊，（長沙：



圖四 《航海述奇》書中之〈地球圖〉

若從題名而言，譯者擴大施登萊《穿越黑暗大陸》的「非洲」預設，題名「三洲」，按 1883 年〈小引〉之解釋：「三洲」乃是指「亞非利加、亞美利加及歐羅巴」，⁸⁷ 即可反映譯者橫跨各洲之意圖。譯者安排人物行進非洲路線時，嵌入各種跟施登萊原著風馬牛不相及的越南風土民情：

土人多面黃而黑，類閩粵產，亦有身軀短矮者，彷彿侏儒。衣以黑色為尚，束以紅巾，纏粗布於首。男女俱不薙髮，垂垂如漆，盤於頸中，齒牙亦染黑，以為美觀。其有戴大帽者，皆功名中人，平人不能有也。俗尚佛教，寺廟觸處皆是，所居房屋，半皆編箬為蓬，削竹為棟，惟宮殿廟署，則皆覆瓦。士大夫多識華文，亦用詩賦取士，設有鄉會科試，如中國然。官場文件，除與法官交涉外，均用華字。是處天時和暖，而夏日則炎暑逼人，揮汗如雨……此該處風土人情之大略也。⁸⁸

上述逸出施登萊原著的片段，乃是出自於譯者筆調，描寫越南民眾外觀、宗教、房屋、制度、語言與氣候等。觀察上述片段，跟口述者龔柴〈越南考略〉（往後收錄於《五洲圖考》時易名為〈越南〉）一文有不少重疊，

岳麓書社，1985），頁 441。

87 清·佚名，〈三洲遊記小引〉，《益聞錄》278(1883.8): 353a。

88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288(1883.9): 413a。

如「取士律用詩賦策略，亦設鄉會科試」、「身軀矮短，有侏儒風」、「賦性獷悍，舉止反覆」、「所讀書籍，與中國同，惟其音則天淵迥異。」⁸⁹

在口述與筆述過程，譯者屢屢「行空天馬，如展足騰驤來域外」，⁹⁰ 自行嵌入各國風土民情，且在一比較的視野下論及各種主題，如談及長壽者時指出：「英屬依郎省有命婦依利氏一百四十一歲、高奴郡味利揚一百四十三歲、瑙威國德辣梗一百四十六歲、蘇靈當一百六十歲」；⁹¹ 談及寶石時提及：「考寶石，產西藏、蒙古、青海、印度、錫蘭等處者為上，作殷紅色，表裏通明。產於美法二國者，石質稍次，而嫩。其無上妙品，則產於緬甸山中，不可多得。」⁹² 除空間橫向的比較外，亦出現時間縱向的描述，介紹各國歷史與器物發明，如「西曆一千八百十九年」，英人拉弗勒發展新加坡：「始築城垣於此，竭力招徠，遂成巨市」；「西曆一千八百三十八年」，美國雪加省紳富「捐貲助建」芝加哥大學；「西曆一千三百八十八年」，日耳曼修士排克刀「究心化學，以硫磺硝煤等物，入石臼擣之」；「一千七百六十四年」，華特用「火煮沸水若干，則得汽若干，其汽所運之機」；「一千五百四十二年」，意大利人「製一表，大如菽，嵌於手記中，上獻諸王」。⁹³

譯著除屢屢出現口述者與筆述者關懷的地理學片段外，亦植入不少晚清海外遊記觀看世界的視角。十九世紀後半葉，中國人士透過各管道航向海外，如 1866 年斌椿與張德彝受總理衙門派赴歐洲考察、1867 年王韜跟隨香港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遊逛歐洲、1868 年志剛 (1818-?) 參與使節團出訪歐美、1876 年郭嵩燾出使英國、1876 年李圭 (1842-1903) 參加美國博覽會等。這些實際出遊的人士，替原本廣泛但稍嫌平面的地理學內容增加立體感，紀錄各地文明體

89 清·龔柴，〈續錄越南考略〉，《益聞錄》108(1881.7): 162b。

90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341(1884.3): 124b。

91 同上註，《益聞錄》644(1887.3): 113a。

92 同上註，《益聞錄》602(1886.10): 466b。

93 同上註，《益聞錄》291(1883.9): 431a；363(1884.6): 256a；365(1884.6): 268b；308(1883.11): 532b；421(1884.12): 606b。

制、科學教育、市政建設與格致器物等。若是比對譯文與彼時各種遊記，即可見到《三洲遊記》塑造一可與彼時遊記相互參照的路線，包括歐亞路程說明、交通工具、西方器物、西餐禮儀、動物園與催眠表演等，掀開海外世界的櫥窗。

《三洲遊記》將施登萊原著勾勒立溫斯敦、史畢克與博頓探勘尼羅河源頭的脈絡，悄然改為晚清涉外人士觀看世界的視角。施登萊原著圖文並茂介紹英國船匠幫忙準備的 Lady Alice（愛麗斯小姐，見圖五），分成易於搬運的五截，進入非洲後用以探勘湖水，⁹⁴ 且論及前輩立溫斯敦等人的汽船在非洲行進與擱淺的經歷，以及彼時非洲各地區之汽輪等。



THE 'LADY ALICE' IN SECTIONS.

圖五 愛麗斯小姐

譯者卻將這些探勘湖水的交通工具，置入十九世紀中國涉外人士記載輪船火車構成、機器發動原理與實際搭乘經驗等脈絡。⁹⁵ 譯者讓人物「考輪船

94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p. 3. 文中提及“it was to be 40 feet long, 6 feet beam, and 80 inches deep, of Spanish cedar 3/8 inch thick. When finished, it was to be separated into five sections, each of which should be 8 feet long.” 由於過於沈重，耗費人力搬運，在非洲期間又請當地木匠改裝。

95 清·志剛《初使泰西記》記錄輪船構成：「長四十丈，載四千噸（每噸一千六百斤）。並船身、機器、煤倉、水井、糧囤、牲圈，總計不知其幾千萬鈞之重。使氣之積也不厚，則其運大舟也無力，將何所恃，由香港而至美國金山口，行兩萬數千里之洋海哉？故船中之氣爐有六。積六爐之蒸氣以入於氣簫，由簫鼓入氣橐，而後上托、下軋之力壯。」張德彝《航海述奇》描繪船隻的外型構造：「此船長二十二丈、廣三丈許，通身鐵製，內包橡木，上寬下狹，狀如魚腹，前尖后圓，形似瓜種」；王韜《漫遊隨錄》提及火車：「泰西利捷之制，莫如舟車，雖都中往來，無不賴輪車之迅便。其制略如巨櫃，左右啟門以通出入，中可安坐數十人，下置四輪或六輪不等。」分別見清·志

創始之由」，侃侃而談蒸汽機的發明經過，從英人納各麥納本銅工(Thomas Newcomen, 1664-1729)發明「汽機運輸」，「不甚靈動」，華特(James von Breda Watt, 1736-1819)「精益求精」，終於讓「汽之為用漸廣」。富當(Robert Fulton, 1765-1815)將汽機「施之於船，初造一小輪船」，「一刻可行十五里，逆風則行十里」，「輪船之用，絕勝常船，且海上戰攻，可以穩便」，最後「大行於諸國」。⁹⁶ 接而又插入施登萊原著未曾出現的火車，安排人物感受「電掣星流，瞬息已杳」速度，介紹車價「凡三等，上等者，坐地精潔寬廠(敞)，每一間容四人。次等者，亦精潔，惟統坐一處，如排雁然。第三等，則局蹐不堪矣」。⁹⁷ 從機械原理、交通發明到搭乘經驗，都可見到譯者根本性置換一對話群體，將施登萊的探索尼羅河源頭轉到屬於晚清脈絡的視角。

《三洲遊記》描寫西餐禮儀、餐具擺列、座位安排到出餐順序，都可見到其如何釜底抽薪，置換地理學對話群。譯者安排麥君等人出席西方餐宴時「按泰西風俗」，寫出箇中細節：男女並座如「男女並重，畧不避嫌，凡有讌會等事，婦女亦得相與，在座執手以為敬，習俗成風」；⁹⁸ 入座順序如「第一位主人之夫人，第二位主教忒楞塞，第三麥領事，第四法領事，第五巴仲和，第六余坐，第七、第八乃西學士富敦及其夫人」；餐桌布置如「上鋪布單，潔白如雪，長桌四圍團設坐椅，鋪以五彩絨裯」；餐具擺設如「置玻璃杯數具，白磁大盆二，白洋布小袱一，長柄紋銀大湯勺一，小湯勺一，銀叉一，純鋼解手小刀一」；出餐順序如「第一饌為饅頭湯」，「西洋饅頭」乃是西洋主食，「大如牛腰，而長且甚堅硬，須以刀剖切之，嚼啖費力」，湯點則「有雞羹鴨臠、魚炙牛心之類」。饅頭湯後則是正餐，有「牛肉、小羊、小豬、雞鵝、鴨兔、鵓雉，無非薰炙」，「須以鋼刀割而

剛，《初使泰西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7冊，頁255。清·張德彝，《航海述奇》，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7冊，頁447；清·王韜，《漫遊隨錄》，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4冊，頁108。

96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308(1883.11): 532b。

97 同上註，《益聞錄》303(1883.10): 502b。

98 同上註，《益聞錄》291(1883.9): 431a。

食之」。⁹⁹ 凡此種種，都不出張德彝對於西餐的描寫範圍，¹⁰⁰ 恰可反映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吸取自身同儕觀看世界的視角。

譯者拼湊、吸收與轉化各種具體而詳實的參照材料，確實可以拓展筆下人物的足跡，可是因非親身體驗，不免繼承箇中盲點。以十九世紀後半葉在西方出現的「催眠術」為例，晚清人士旅居海外時已然觀賞與紀錄。1874年負責護送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學的祁兆熙(?-1891)《游美洲日記》敘述自己與容閔(1828-1912)與陳蘭生(1898-1969)等人觀看「女巫幻法」的經驗：場地陳設如「中國戲館，觀者已濟濟矣」，舞臺上一女子彈奏大洋琴，一女子以手勢催眠觀眾，「用手一指」，可任意催眠觀眾做出各種動作，「如救火狀，如洗衣狀，如跑馬狀，如驚恐將死狀」，甚至「搶枱上生菜一大顆食之」。¹⁰¹ 1880年7月，《益聞錄》刊登曾經滄海的海外通訊文章〈美國舞戲記略〉比起祁兆熙的記載，有更多細節，如「四圍列座，可容千餘人」，舞臺上女子透過剪紙與眼光凝視法催眠觀眾，「或耕田，或獵鳥，或如乘騎，或似駕舟」，且「能令人生平隱事，盡皆侃侃而言」，並且「催眠飲膳」，「舞者咸排座爭啖之，似甚有味」。¹⁰² 譯者將上述各種表演細節搬入《三洲遊記》，讓人物觀賞催眠表演，從舞臺、表演者、催眠內容等描寫，都與上述記載如出一轍，且同時移植箇中侷限。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遊記作者大多無法斷定催眠術的表演性質，

99 同上註，《益聞錄》294(1883.9): 448b-449a。

100 張德彝對於西餐的介紹：「先鋪桌布，按位置湯匙一、大刀二、大叉三，舍利與克拉利高玻璃盅各一，厚玻璃杯……以木盤鋪白布，盛大麵包，旁一牛耳刀……上湯時，按人數捧進瓷盤，及湯一盆、勺一把，置首座前。上菜亦然。菜盤左右放大刀叉各一，以便割分。旁廚與長方盤所置，與請客同……二僕進菜，一由男主右之女，遞至女主左之男；一由女主右之男，遞至男主左之女……凡晚餐，除湯魚、青菜外，另備帶骨肉數種，如大小牛肉、大小羊肉，雞鴨、火雞、鐵雀、鶉鶉等，分時而進……肴進畢，則上拌生菜，系一手持空盤，一手托青菜盆，按位請示。繼上水晶糕、冰乳糕，聽客自取。」清·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8冊，頁627-629。

101 清·祁兆熙，《游美洲日記》，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3冊，頁235。

102 清·曾經滄海，〈美國舞戲記略〉，《益聞錄》56(1880.7): 153b。

常以疑問句揣測，如祁兆熙《游美洲日記》之疑問：「此何術？」、「聞西法有電氣類，拍人，人即不知人事，此其是歟？」¹⁰³ 曾經滄海〈美國舞戲記略〉結尾處亦以反問句作結：「人謂此殆不免有妖術也，其信然乎？」¹⁰⁴ 當《三洲遊記》搬演催眠術表演時，也以一連串疑問句作結：「不知何自而至，真莫名其妙也。其餘變幻多端，大率類此說者，謂該女憑鬼致者，理或然歟？」¹⁰⁵ 一直要到一、二十年後，中國作者才能更清楚道破催眠術道理。¹⁰⁶

固然，《益聞錄》基於地理學關懷而翻譯連載《三洲遊記》，可是卻因自身的立場與訴求而抽離原著脈絡，導入晚清人士述說世界普遍地理的口吻，將原著的尼羅河探勘者的群體對話，變為是晚清涉外人士觀看世界的視角，介紹西方交通工具、器物與餐禮等知識話語，開啓海外世界的櫥窗。

五、結 語

作為《三洲遊記》口述與筆述者的龔柴與鄒弢，在翻譯改寫的過程中，注入上海天主教會、滬地文藝圈與晚清地理學等脈絡的價值關懷與問題視角，大幅度偏離施登萊原著脈絡。譯者根基於自身的立場，吸收、轉化與匯聚不同來源的材料，衍生一條條縱橫交錯的翻譯「歧路」，通往自身的脈絡，如宗教信仰、文人互動圈與歷史地理學等。這些看似天馬行空的片段，固然可以視為翻譯技術上的失誤，可是箇中卻隱藏著更複雜的理念、想法與情感的拉鋸、篡奪、轉調等，乃是譯者對於外在世界的回應，投射特定的宗教理念、理想憧憬與新世界觀。

連載於天主教會機關下的《益聞錄》的《三洲遊記》，呼應報刊立場，植入天主教誨與義理，演繹各種可以歌頌天主教義的情節。接受天主神學

103 清·祁兆熙，《游美洲日記》，頁 235。

104 清·曾經滄海，〈美國舞戲記略〉，《益聞錄》56(1880.7): 153b。

105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623(1886.12): 593a。

106 相關文章如〈格致——人力催眠術〉，《知新報》53(1898.5): 22ab；〈雜錄——催眠術能療酒癖〉，《大陸報》6(1904.6): 92；〈外國學事——催眠術〉，《教育世界》80(1904.7): 4。

訓練、擔任司鐸的口述者龔柴，經由翻譯改寫的方式，壓抑施登萊原著提及的基督教成分，安排人物遊走各地天主教堂，詳細介紹天主教最顯赫的聖殿聖伯多祿大堂，且在非洲教區導入徐家匯土山灣教會的印刷館與工藝廠學制。譯者透過自行衍生的情節片段，呼應《益聞錄》的宗教訴求，批判中國迷信風俗，恰能反映譯者如何基於宗教信仰而出現的翻譯轉向。

除宗教教義轉變外，譯者導入滬地文人情誼的表述模式，反映彼時文人如何圍繞於新興媒體表達文人交遊的情景，拓展一遠不同於原著的面貌。就《三洲遊記》展現的詩學、情感與美學，更可能是來自筆述者鄒弢。就在《申報》刊登袁祖志海外遊記的同一時段，鄒弢也在《益聞錄》編織一可跟袁祖志海外之旅媲美的《三洲遊記》。從路程說明、人物組合到行程感慨等，都可見到譯者因回應文友的亞歐之旅而逐步偏離施登萊原著脈絡。當鄒弢翻譯施登萊原著時，觸動情懷，滲入現實中哀悼生平第一知己俞達的情感，讓兩位中國人物在非洲途中演繹譯者自身的情感。從情節經營到文句氣氛之烘托，都可見到譯者透過文人化的詩詞創作方式，寄寓一己的情懷。

同樣關注地理學，譯者卻有不同於施登萊的步調、問題與想法，將原著尋找尼羅河源頭的主軸，擴大為晚清人士更為關注的歷史地理學論域，如同〈小引〉所稱的「吾輩行空天馬，如展足騰驤來域外」。原著的地理學對話群，變為是晚清各涉外人士的視角，介紹西方交通、餐飲禮儀、催眠表演與園林遊逛等內容，掀開海外世界的櫥窗。兩位對於地理學有高度興趣的譯者導入自身關注的焦點，虛構中國文人隨西方人物闖蕩五湖四海的情節，衍生原著所無的東亞、南洋、南亞等路線。在人物行進非洲途中，又頻頻穿插各地歷史、地理、風土與民情等，使得施登萊原著的地理學對話群產生結構性的轉變。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王韜，〈漫遊隨錄〉，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 4 冊，長沙：岳麓書社，1985。
- 清·佚名，〈三洲遊記小引〉，《益聞錄》278(1883.8): 352b-353a。
- 清·佚名，〈外國學事——催眠術〉，《教育世界》80(1904.7): 4。
- 清·佚名，〈本館李問漁司鐸逝世〉，《聖心報》25.7(1911.7): 212-213。
- 清·佚名，〈書中法新約後〉，《益聞錄》361(1884.5): 242a。
- 清·佚名，〈格致——人力催眠術〉，《知新報》53(1898.5): 22ab。
- 清·佚名，〈益聞錄弁言〉，《益聞錄》1(1879.3): 1a
- 清·佚名，〈教務要聞追悼龔古愚司鐸〉，《善導報》1914.12: 46。
- 清·佚名，〈魂在全身論〉，《益聞錄》16(1879.9): 92b-93a。
- 清·佚名，〈論人魂永生〉，《益聞錄》24(1879.11): 140a。
- 清·佚名，〈雜錄——催眠術能療酒癖〉，《大陸報》6(1904.6): 92。
- 清·吳詠秋，〈題龔古愚司鐸〈地輿圖考〉調寄金縷曲〉，《益聞錄》286(1883.9): 401b。
- 清·志剛，〈初使泰西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 7 冊，長沙：岳麓書社，1985。
- 清·李圭，〈環遊地球新錄〉，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 4 冊，長沙：岳麓書社，1985。
- 清·李杕，〈序〉，龔柴·許彬合編，《五洲圖考》，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1898，頁 3a-3b。
- 清·詠甫世瀛，〈倉山舊主應唐景星觀察之聘將有泰西之行賦此贈請諸大吟壇正和〉，《申報》第 3598 號（1883.4.21），頁 4。
- 清·祁兆熙，〈游美洲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 3 冊，長沙：岳麓書社，1985。
- 清·臥霞逸士，〈倉山舊主翔翁明府鄉大人，素擅詩才，久滬邦所共仰，今應唐景星觀察之聘，歷游海邦，見有友人送行詩三章因步其韻錄請諸大吟壇正之〉，《申報》第 3603 號（1883.4.26），頁 4。
- 清·俞鍾詔，〈寄懷瘦鶴詞人〉，《益聞錄》162(1882.6): 172b。
- 清·倉山舊主，〈舟入錫蘭島〉，《申報》第 3704 號（1883.8.5），頁 3。
- 清·倉山舊主，〈舟行南洋中三十餘日苦熱日甚感而有作〉，《申報》第 3704 號

(1883.8.5), 頁 3。

清·倉山舊主,〈亞丁鳥〉,《申報》第 3704 號(1883.8.5), 頁 3。

清·海門放眼達觀人,〈古愚龔公小傳〉,《聖教雜誌》4.2(1915.2): 66-67。

清·袁祖志,〈癸未李春唐景星觀察招游歐洲倚裝漫成即呈諸大吟壇正之〉,《申報》第 3704 號(1883.8.5), 頁 11。

清·袁祖志,《談瀛錄》,上海:同文書局,1884。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 7 冊,長沙:岳麓書社,1985。

清·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 8 冊,長沙:岳麓書社,1985。

清·條吟,〈賀龔古愚司鐸壽辰〉,《善導報》1914.12: 66。

清·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 6 冊,長沙:岳麓書社,1985。

清·尊聞閣主人,〈點石齋畫報緣啓〉,《點石齋畫報》甲集 1 期(1884.5): 2。

清·曾經滄海,〈美國舞戲記略〉,《益聞錄》56(1880.7): 153b。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三洲遊記〉,《益聞錄》279(1883.8): 359a。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280(1883.8): 364b ; 284(1883.8): 388b ; 286(1883.9): 401a ; 288(1883.9): 413a ; 289(1883.9): 418b ; 291(1883.9): 431a ; 294(1883.9): 448b-449a ; 303(1883.10): 502b ; 308(1883.11): 532b ; 318(1883.12): 593b ; 319(1883.12): 599a ; 321(1884.1): 4b ; 341(1884.3): 124b ; 352(1884.4): 191a ; 363(1884.6): 256a ; 365(1884.6): 268b ; 421(1884.12): 606a ; 431(1885.1): 47a ; 533(1886.11): 54a ; 541(1886.3): 101a ; 544(1886.3): 118b-119a ; 553(1886.4): 173a ; 602(1886.10): 466b ; 623(1886.12): 593a ; 635(1887.2): 58b-59a ; 640(1887.3): 88b ; 644(1887.3): 113a ; 736(1888.2): 52a。

清·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上海:上海中西書室,1900。

清·梁溪瀟湘館侍者輯,《春江花史》,上海:二石軒印行,1884。

清·鄒弢,〈心禪居士自虞陽貽書來尙湖漁隱附詩寄懷即次原韻呈政〉,《益聞錄》162(1882.6): 172b。

清·鄒弢,〈李小寶詞史詩詢近況原韻奉答〉,《申報》第 2374 號(1879.12.8), 頁 3。

清·鄒弢,〈和花影詞人贈湘蘭韻錄塵晒正并乞縷仙朵紅賜刊〉,《益聞錄》441(1885.3): 107a。

清·鄒弢,〈宮閨聯名譜題詞即塵縷馨仙史正可〉,《申報》第 1410 號(1876.11.27),

頁 3。

清·鄒弢，〈賀新涼·再贈賦秋生并柬存恕齋主人正和〉，《申報》第 1808 號（1878.3.20），頁 3。

清·鄒弢，〈滿江紅·再題陳卓軒珍硯齋圖代徐佩之丈作〉，《申報》第 1869 號（1878.5.30），頁 3。

清·鄒弢，〈懷龍湫舊隱兼寄縷馨仙史味梅館主賦秋生倉山舊主飯穎山樵〉，《申報》第 2340 號（1879.11.4），頁 4。

清·鄒弢，《三借廬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鄒弢，《三借廬贅譚》，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126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齊學裘，〈癸未三月中澣倉山舊主翔甫仁兄世大人應聘出洋壯游各國詩以送之用其祝壽原韻〉，《申報》第 3597 號（1883.4.20），頁 3。

清·慕真山人，〈和瘦鶴詞人留別原韻〉，《益聞錄》123(1881.10): 252a。

清·編者，〈告示〉，《益聞錄》193(1882.4): 365b。

清·薛福成，〈薛敘〉，《泰西各國新政考》，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版本，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清·鄭富灼，〈六十年之回顧〉，《良友畫報》47(1930.5): 13。

清·龔柴，《地輿圖考》，上海：益聞館，1883。

清·龔柴，〈續錄越南考略〉，《益聞錄》108(1881.7): 162b。

“Sir Henry M. Stanle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04.5.12, p. 5.

“Sir Henry’s Funeral.”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04.6.21, p. 5.

Stanley, Henry M.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London: George Newnes, 1899.

二、近人論著

（法）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ere）編著，上海金文祺譯，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 1983 《江南傳教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孫 瀟 2011 「天主教在華第一份中文期刊《益聞錄》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張若谷 1938 〈古文家李問漁傳〉，《聖教雜誌》27.6(1938.6): 420-422。

陳伯熙 2000 《上海軼事大觀》，上海：上海書店。

鄒振環 2010 〈土山灣印書館與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2010.3(2010.5): 1-14。

錢琬薇 2007 〈中國近代報人——鄒弢其人其書〉，收入錢琬薇，「失落與緬懷——鄒弢及其《海上塵天影》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30-73。

顏健富 2015 〈晚清文化界對於 David Livingstone 與非洲探勘記的接受與傳播〉，收入李爽學、胡曉真編，《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頁 448-449。

顏健富 2018 〈拆除主幹，拼湊片段：論《斐洲遊記》對於施登萊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的重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53(2018.9): 1-46。

龔司鐸 1914 〈近事：本國之部：龔司鐸西滿〉，《聖教雜誌》3.4(1914.4): 176-177。

Hermans, Theo, ed. 1985.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Lefevere, Andre.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rom the Catholic and Literary Circles of Shanghai to Travel Literature: The “Translation as Rewriting” of *Sanzhou Youji* in the Late Qing

Guan Kean-fung*

Abstract

Resulting from different contexts, translation becomes a form of rewriting to varying degrees as the original work is translated into a new writing. This article uses *Sanzhou youji* 三洲遊記 (*Three Continents Travels*), a translated work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as an example of this phenomenon to investigate how Chinese translators from specific contexts, such as the influences of Catholicism, literary circles in Shanghai, or travel writings from abroad, exhibited their shared anxieties regarding self-survival as they translated Henry M. Stanley’s (1841-1904) autobiography of Africa: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The translators “diverged” from the original work by inserting the concerns and values of a different community into the new writing.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how the translators echoed the religious demand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Shanghai by rewriting the religious elements in the original work into a proclamation of Catholicism. Secondly, the author considers how the translators fit details from their personal lives and poetic aesthetics into the translated work, which allowed for a dialogue engaged in by literary scholars in Shanghai to appear within a work regarding the explorations of an individual in Africa. Finally,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from a late-Qing world view, the translators perceived the geography found in the original work and introduced the various cultures and social customs, all of

* Guan Kean-f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which demonstrates a distinct imagination of the foreign. Through these points of analysis, we are able to see how translated work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identities of the translator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s, and religious demands, which ultimately lead to the original being rewritten through translation.

Keywords: Africa, travel literature, late Qing, Tao Zou 鄒弢,
Simon Kiong 龔柴, *Sanzhou youji* 三洲遊記

